

任贤则治 任奸则乱

——唐玄宗的用人得失

孙崇政

唐代开元时期,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极为昌盛的黄金岁月,世称“开元盛世”。之所以出现“开元盛世”,关键在于唐玄宗能够任人唯贤。

唐玄宗文韬武略,英断多艺,是历代帝王中的佼佼者。唐睿宗景云元年(公元710年),他为临淄王,与他的姑母太平公主发动宫廷政变,一举诛灭了阴谋篡夺皇位的韦武集团,拥立他的父亲李旦为帝,是为唐睿宗,自己被立为皇太子。开元元年(公元713年),又诛杀了势倾朝野、擅权用事的太平公主及其党羽,从此玄宗真正掌握了皇帝大权。

唐玄宗即位后,鉴于纲纪废

弛,吏治腐败,乃锐意革新,整饬吏治。首先他任用“明于吏道,割断不滞”的姚崇为相。姚崇向玄宗提出“抑权幸、爱爵赏、纳谏诤、却贡献、不与群臣褻狎等十事”,被玄宗全部采纳,同时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,从而为“开元盛世”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,被称为

“救时宰相”。晚唐诗人杜牧赞其“首佐玄宗起中兴业”。

开元四年(公元716年),姚崇举荐宋璟自代。宋璟为相,“务在择人,随材授任,使百官各称其职;刑赏无私,敢犯颜直谏”。玄宗“甚敬惮之。虽不合意,亦曲从之”,而且把宋璟的进言书立座右,作为鉴戒。史称:“姚、宋相继为相,崇善应变成务,璟善守法持正;二人志操不同,然协心辅佐,使赋役宽平,刑罚清省,百姓富庶。”

宋璟之后,张嘉贞、张说、李元纘、杜暹、韩休、张九龄相继为相。这些人虽不如姚、宋,但各有所长。史学家赞美唐玄宗开元年间所用

之相:“姚崇尚通,宋璟尚法,张嘉贞尚吏,张说尚文,李元纘、杜暹尚俭,韩休、张九龄尚直,各其所长。”

然而,“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。”唐玄宗做了25年皇帝之后,“渐肆奢欲,怠于政事”,而且变得爱谀恶直、愎谏自贤,特别在用人方面,良莠不分、善恶莫辨。开元二十四年(公元736年)唐玄宗要任“柔佞多狡数”巧伺上意的李林甫为相,张九龄谏道:“宰相系国安危,陛下相林甫,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。”但玄宗忠言逆耳,一意孤行,还偏信李林甫谗言,罢了张九龄的相位,“自是朝廷之士,皆容身保位,无复直言”。

天宝三年(公元744年)经高力士引荐,把姿质丰艳、能歌善舞的杨玉环召入宫中,玄宗“如得至宝”。“春宵苦短日高起,从此君王不早朝”,终日纵情于声色之中,国家大事均委之李林甫。杨玉环册为贵妃后,杨氏家族个个平步青云,飞黄腾达,亡父、叔父、从兄、胞姐都被封官赐爵,势倾天下。正如唐德宗时政治家陆贽所说的:“天宝之季,嬖幸倾国,爵以情授,赏以宠加,纲纪始坏矣”。

唐玄宗“晚年自恃承平,以为天下无复可忧,遂深居禁中,专以声色自娱。”有一天,唐玄宗对高力士说:“朕不出长安近十年,天下无事,朕欲高居无为,悉以政事委林甫,何如?”高力士坦诚地回答:“天下大柄,不可假人;彼威势既成,谁敢复议之者!”唐玄宗听了,很不高兴,吓得高力士“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”。

李林甫为相19年,《资治通鉴》总结他的四大奸恶:“媚事左右,迎合上意,以固其宠;杜绝言路,掩蔽聪明,以成其奸;妒贤嫉能,排抑胜己,以保其位;屡起大狱,诛逐贵臣,以张其势。”结果,养成天下之乱,而玄宗执迷不悟。

文史随笔

天宝十一年(公元752年),李林甫病死,唐玄宗竟任嗜酒善博、不学无行的无赖——杨贵妃的从兄杨国忠为相。杨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,无威仪。既为相,以天下为己任,裁决机务,果敢不疑。居朝廷,攘袂扼腕,公卿以下颐指气使,莫不震懼;“专徇帝嗜欲,不顾天下成败,台省官有才行时名不为己用者,皆出之”;又广收贿赂,“中外饷遗辐辏,积缗至三千万匹”。

唐玄宗晚年,不但骄侈怠政,而且贪求边功,有“吞四夷之志”,动辄对少数民族使用武力,狡黠的胡人安禄山,就是以边功得到玄宗宠信的。天宝六年(公元747年),玄宗诏令河西、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,王忠嗣上言:“石堡险固,吐蕃举国守之,今顿兵其下,非杀万人不能克;臣恐所得不如所亡,不如且厉兵秣马,俟其有衅,然后取之。”玄宗很不高兴,当时将军董延光自请率兵取石堡城,玄宗命王忠嗣分兵助之。王忠嗣不得已奉诏。

结果,董延光没有攻克石堡城,却怪罪王忠嗣“阻挠军计”。奸相李林甫素忌王忠嗣“功名日盛,恐其入相”,便乘此机会使人诬告王忠嗣“欲拥兵以尊奉太子”。玄宗听信谗诬,敕命王忠嗣入朝,委三司审问,三司奏忠嗣罪当死。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入朝力陈忠嗣之冤,并请以自己的官爵为忠嗣赎罪,王忠嗣才得免死,贬为汉阳太守,仅两年,得暴病死。

王忠嗣忠诚奉国,统率四镇,“以持重安边为重”,史称其“立功边域,为世虎臣,班超、傅介子之流也”。在当时,朝廷正需要王忠嗣这样的大将,然而却被昏君奸相贬黜而死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损失。

唐玄宗在贬黜王忠嗣的同时,



唐玄宗



李林甫

却对“外若痴直,内实狡黠”的安禄山日益宠信,任以范阳、平卢节度使兼御史大夫。天宝七年(公元748年)六月,又赐安禄山铁券(帝王颁赐功臣授以世代享受某种特权的铁契);天宝九年(公元750年)五月,赐安禄山爵东平郡王,(唐将帅封王自此始);天宝十年(公元751年),玄宗“命有司为安禄山治第于亲仁坊,敕令但穷壮丽,不限财力”,用物皆饰以金银。同年,玄宗又同意安禄山的请求,兼任河东节度使。安禄山“既兼领三镇,赏刑已出,日益骄恣”。杨国忠和太子都说安禄山必反,而昏愤的玄宗不但不听,反而对安禄山更加亲信。

“渔阳鼙鼓动地来,惊破《霓裳羽衣曲》。”安禄山“专制三道,阴蓄异志,殆将十年”。天宝十四年(公元755年)十一月,以讨杨国忠为名,率军15万众,长驱南下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:“时海内久承平,百姓累世不识兵革,猝闻范阳兵起,远近震骇。河北皆禄山统内,所过州县,望风瓦解,守令或开门出迎,或弃城窜匿,或为所擒戮,无敢拒之者”。仅仅10个月时间,叛军就攻陷东都洛阳。灵宝一战,唐军溃败,潼关失守,玄宗连夜仓皇出逃。在逃至马嵬驿(今陕西兴平西)时,扈从的六军将士痛恨杨国忠祸国殃民,发生哗变,射杀了杨国忠,并逼迫玄宗缢杀了杨贵妃,这才平息众怒,逃往成都。京都长安,也很快落入叛军之手。长达9年的安史之乱,使唐朝的半壁河山陷入兵荒马乱之中,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,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,而大唐帝国也从极盛的顶峰跌落下来,以至一蹶不振。

古人云:“贤者用之,则天下治;不肖者用之,则天下乱。”

“国以贤兴,以谄衰;君以忠安,以佞危。”这是被无数史实所证实的颠扑不破的真理。要问开元何以致治,天宝何以致乱?五代后晋史学家刘昫在《旧唐书·玄宗纪》的评论中回答了这个问题,他说:“……开元之初,贤臣当国,四门俱穆,百度唯贞……俄而朝野怨咨,政刑纰缪(错误),何哉?用人之失也。”

北宋治平元年(公元1064年),英宗问执政:“唐明皇(即玄宗)治致太平,末年何以至此?”枢密使富弼答道:“明皇初平内乱,励精求理,为政得人,所以治安;末年任非其人,遂至祸乱。人主唯在择人,决不可使奸人当国事也。”这些评议十分中肯,给人以有益的启迪。文